



CHINA NEWS DIGEST — CHINESE MAGAZINE (CND—CM)

• — • — •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(CND) 主办 • — • — •

—— 增刊 第八十一期 ——
(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出版)

本期目录 (zk1108b)

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【史海钩沉】 | 简析两种毛派：保皇派与造反派 | 陈子明 |
| 【各抒己见】 | 金冲及为尊者讳 | 邓海南 |
| 【往事非烟】 | 一个“刽子手”的自白和忏悔 | 陈义名 |
| 【救赎之路】 | 一个昔日武斗杀人红卫兵的自责 | 彭 淑·张嘉衍 |
| 【口述历史】 | 我所知道的红卫兵——卜大华口述(下) | 卜伟华等 |

小启：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《文革博物馆》“最新展出厅”及各有关“展厅”，欢迎前往参观。

文革博物馆网址：<http://museums.cnd.org/CR>

欲订阅本刊《文革博物馆通讯》请致函 cnd-info@cnd.org 获取订阅资讯。

来稿请投寄 tougao@cnd.org。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简析两种毛派：保皇派与造反派

• 陈子明 •

2011年5月24日，刘思齐（自称“毛岸英遗孀”）、毛小青（毛泽东侄女）、张宏良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）等51人，在毛派网站“乌有之乡”刊登《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軾和辛子陵》，指控茅于軾为辛子陵《红太阳的陨落》一书撰写的读后感《把毛泽东还原成人》“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、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”，“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”，“是茅于軾、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，制造动乱”，“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并以“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……的北京市人民群众”的名义，要求“公诉茅于軾和辛子陵”，同时呼吁“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”，“揭露茅于軾和辛子陵的罪行”。

5月2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以“中纪闻”的名义发表了《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》，称“极少数党员、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纲领、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、我行我素；有的对中央的决策和要求阳奉阴违、另搞一套；还有的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，甚至捕风捉影，编造传播政治谣言，丑化党和国家形象，在干部、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。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的。”“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政治纪律的约束，决不允许在群

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，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，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，决不允许编造、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，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，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。”毛派网站与官方喉舌，一唱一和，配合极为密切。

随后，“乌有之乡”的文章称：5月27日，“毛主席的好学生、好战士——张宏良同志在中央主要媒体CCTV第一次公开亮相”，是“一个振奋人心的政治信号”。“乌有之乡”所展示的“公诉”活动则越来越热闹，各省市自治区的“人民群众”分别组团联署，各地声讨批判会的视频也上了网。

有人说，刘思齐、张宏良等人的心理状态、语言类型和行为方式，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要说，文革中的红卫兵虽然都带着红袖章，举着红宝书，山呼“毛主席万岁”，但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和所争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。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红卫兵——保皇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，刘张等人是源自保皇派红卫兵，而不是造反派红卫兵。

保皇派红卫兵标榜“根红苗正”，发起者大多是高干子女，从诞生之日起就鼓吹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“阶级路线”。他们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先是在学校里批斗“学术权威”、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、“反动学生”、“狗崽子”，然后到社会上抄资本家的浮财，赶成分不好的人出城，再到使馆区冲击苏联大使馆。在毛泽东批判“资反路线”的时候，他们因为“保爹保妈”而被打入冷宫，但很快就因为紧跟掌权的军队干部而再次受宠，在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、“深挖五一六集团”、“一打三反”运动中充当打手。文革结束后，一部分保皇派红卫兵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成为“第三梯队”的优先选拔对象。

造反派红卫兵则要推翻“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‘官僚主义’者阶级”、“‘红色’资本家阶级”（本段引文均出自杨小凯1968年初《中国向何处去？》），“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——‘中华人民公社’”。根据笔者了解，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一开始就大力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“大跃进一大饥荒”中饿死人的政治责任，还有些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插手底层维权的问题。譬如杨小凯就提到：“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、政策、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、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。目前，‘极左派’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，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。”造反派红卫兵从1967年起就在政治上反复受到打击，杨小凯在文革中被判刑十年，更多的人在文革后被判刑。从整体上说，造反派红卫兵在1976年以后被剥夺了三十年的话语权，近几年来，他们开始在网络上重新发声。

刘思齐、张宏良这一类的保皇派毛派，与源自造反派红卫兵的另一部分毛派，虽然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，二者的社会性质与政治目标则相差甚远。保皇派毛派，仍然是“保爹保妈”派，以“捍卫红色政权永不变色”、“代代相传”作为自己的宗旨。他们仍然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反对民间资本家，反对“叫兽”，反对“黑律师”，反对“反动文人”，只不过是换了一顶帽子，以“汉奸”取代了“牛鬼蛇神”而已。他们反这个反那个，可就是不敢触及党内的当权派，如果他们骂党内的某个人，这个人不是已经退休的干部，就是处于政治弱势的少数派。

1966年的时候，我只是一名初一学生，无缘结识造反派红卫兵人物，袁庚华是我在几年前面晤过的第一位“老造反派”。他曾是鼎鼎有名的“河南二七公社”的负责人之一，文革中和文革后四次入狱，坐牢十几年，1989年初出狱，1995年起创立、经营郑州思想沙龙，与各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交流。最近，陈宜中在台湾《思想》杂志第18期发表了《永远的造反派——袁庚华先生访谈录》，我们正好依据此文简单介绍一下造反派毛派的思想。

袁庚华说：“‘太子党’和官僚资产阶级是当代中国最右的政治力量，我们称之为大右派。所谓‘太子党’应该是指一部分有政治野心的，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群体，绝不是指所有‘红二代’。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，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，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，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。我们一些人认为：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，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，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。但是中国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，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，所以当时吵翻了。”袁庚华自称“永远的造反派”，就是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人。

袁庚华说：“总有人对我讲，就是毛泽东在，也不会喜欢我这个造反派。我承认！但是，要投身中国的革命，还是必须跟他走。我因文革问题四次被捕入狱，每一次的第一个罪名都是‘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’。……我在监狱中也对文革做过全面回顾和反思，几十年的反复思考，使我更认识到：毛主席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，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上。放手让6、7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（95%以上）直接地、全面地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，而不是仅仅为国家和地区选几个做主的人。”“20世纪以后，凡是执政的政党，都尽量去适应官僚机器。结果，各个政党都官僚化了，都变质了，其群众性、民主性都逐渐失去。所以说，20世纪应该称为官僚政治的世纪，包括苏联和中国。……就是当年毛主席那样的威信魄力，在共产党这个官僚集团面前也常常显得无奈。在‘四清’搞不下去后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所以他说‘只有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，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’，这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！除了支持国家统一的最基本条件（中央的最高权力和军队主体），把共产党的官僚集团砸了个稀巴烂，天也没塌下来！西方的官僚主义所受到的制约也是几百年来民众斗争取得的，只是其民众参与的广泛性、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彻底性，远不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。官僚主义唯一的致命敌人，就是最广泛的民众组织的斗争。”

袁庚华说：“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，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。我不反对形式民主、选举民主，但我认为还不够，必须有大民主来补充不足。……今天的条件和已有的经验来说，把古希腊民主精神、程序民主、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结合起来，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民主方式。”“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左翼群体，也就是造反派，这几十年来在深受了专制的残酷迫害后，普遍渴望民主。而对于大多数有左翼倾向的民众来说，他们只是一时还没有分清程序民主和我们自己主张的大民主的不同，以及两者结合的必要性，但也同样要求民主。在大陆社会中强烈要求民主的，是毛派及其影响的广泛的底层毛派群众。大陆民主运动的希望，或者取得民主的主要希望，就在底层毛派的群众运动。当然，仅仅是他们也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使命。”

袁庚华提出了“234”主张：“2”是指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；“3”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、六四分子、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；“4”是说医疗、教育、住房、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。他认为“人的基本政治权利，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，到出版自由，到游行示威的自由，都必须得到保障”。袁庚华希望毛派能够接受程序民主，希望自由派能够接受大民主，“就是有条件地尊重对方的民主”。“黑龙江当年文革夺权后的省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，尽管至今仍是毛派”，但他比袁庚华更进了一步，“不但公开批评毛主席的错误是没有把民主制度化，甚至主张宪政民主”。

由于造反派毛派从根本上否定保皇派毛派的左派性质（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就不是左派），是“戴着‘左派’的面具有意在引导民众‘不反皇帝’！是以‘左翼力量’的名义来为修正主义保驾护航！是以搞乱左派思想的手段来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现状！”保皇派毛派已经把前者视为自己最危险的对手。张宏良在最近的文章中承认自己是保皇派（“他们所谓的皇帝是指谁？如果是指共产党，那么他们说对了”），强调要警惕“左右合流”，声称“左右合流的实质是充当汉奸带路党，一旦形成潮流势必灭亡党亡国亡百姓”，“左右合流是毛派共产党人无论如

何不能跨越的政治底线”。在这里，他再次扩大了“汉奸”阵营，给造反派毛派戴上了“左派带路党”的帽子，并说“左右两派带路党已经如同兄弟般走到了一起”，“很难区分清楚双方之中哪一个更加疯狂”。

我在2007年的《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》中写道：“由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，文革中的毛主义既有‘大民主’、‘巴黎公社式的选举’、‘踢开党委闹革命’的一面；又有‘红色恐怖’、‘群众专政’、‘军事官僚专制’的一面。因此，今日的毛派面临着一种抉择的困境。大部分毛派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，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进行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’的实践。对于这部分人来说，现在是否要‘重上井冈山’，尚未作出政治决断。事实上，他们也受到专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，对于统治集团上层还心存幻想。据笔者所知，也有一部分毛派、文革派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阶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，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理念的问题，但仍然处于内部酝酿的阶段。”我当时对于毛派能够作出这样的分析，得益于我与袁庚华的讨论。几年过去了，基于“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”所导致的当下毛派的理论与政治分化，也越来越清晰了。对于袁庚华、范正美这样的毛派，宪政民主派是完全可以与他们形成“左右翼联合阵线”的。至于张宏良这样的保皇派毛派，他们根本就不属于左派阵营，他们是形左实右的“专政右派”的别动队，是纳粹主义（国家社会主义）的忠实信徒，是中国法西斯运动的骨干力量。

□ 原载《中国人权双周刊》

~~~~~

【各抒己见】

金冲及为尊者讳

• 邓海南 •

在共识网上读到金冲及谈《“文化大革命”毛泽东错在哪儿》一文，其标题提示为：

曾有西方学者认为，毛泽东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。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，他说，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，我们要问两个问题，第一，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？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？不存在这个问题。第二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，那用不着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刘少奇那样的地位，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就站不住了。

金冲及的观点才是站不住的。在此回答这位中共党史专家的两个问题：

第一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基于毛泽东的感觉，而不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的感觉。普通老百姓，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都不会认为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威胁，所以才会对文革的突如其来完全不理解。毛泽东之所以以非常方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，当然是他感到了大权旁落才处心积虑这么干的，所以才有很长的前奏，所以才要派内人江青到上海去炮制发难文章，所以才要组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来做为自己的政治打手。不能因为你金冲及好心地认为“谁能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？”他就没有这个动机了。一个专门研究党史的人，竟然连毛泽东的狂想与空想受到了党内一批务实派的抵制都看不到，不认为这种抵制在毛看来就是对他至高无上权力的威胁，不是太迂腐了吗？当然，对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彭真等等务实派来说，他们恐怕确实没有想过要废黜毛的太上皇地位，但是他们在治国的实际工作中不按照毛的那一套来，这已经让毛无法容忍了。所以毛才说北京市委“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”；所以毛才要“炮打”另一个所谓“资产阶级司令部”！

第二，金冲及说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，那用不着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刘少奇那样的地位，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就站不住了。这更是一种迂腐和幼稚，或者就是要为尊者讳才作如此说。请问，“炮打司令部”这样一张大字报，是在什么环境下才得以抛出？不先发动当时除了他自己和一小撮心腹才明白的所谓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，他的这张大字报将如何抛出？在哪里抛出？按照党章党规，党员之间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解决；党的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们有意见更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解决。以毛泽东的党主席之尊，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解决呢？正是因为他明白他想夺回旁落权力的企图无法在党的会议上明言，也无充足理由像庐山会议那样把刘少奇变成另一个彭德怀，这才迂回曲折、四渡赤水般地以非组织手段发动了“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金冲及如此见识，作为一个党史专家岂不有愧？

金专家还提到：毛泽东曾经跟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了那样一段话，“我提出主要问题，他们接受不了，阻力很大。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，这不是为我个人，是为将来这个国家、这个党，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、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。我很担心，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。我现在还活着呢，他们就这样！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，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。”（是啊，这个班交给别人都不放心，只有交给毛家人才放心，这不是权力斗争是什么？）

“我没有私心，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，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。所以我依靠群众，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。”

“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？有谁认真想过？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。”（他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了吗？他想到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，为什么不想新中国建立以后死了多少人？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？对于他当政下发生的大饥荒，毛表示过一点点歉意吗？不但没有，反而是刘少奇那句话：“人相食，将来要上史书的！”表明了最高领袖和老百姓之间，刘的同情心和责任心是在老百姓这一边，这正是毛要搬倒刘的一个重要因素。）

对于金冲及来说，引了毛泽东的几段话，他就完全相信，并且也信誓旦旦地要别人相信，既然如此，让大家都回到文革年代直接去“读毛主席的书，听毛主席的话”就是了，还研究什么党史？

金冲及还说：“大家知道，高文谦曾写过一本书《晚年周恩来》，他在序言里面提到，周恩来死后不久，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放鞭炮。很多读者看到这段文字，感觉毛泽东是丧尽天良，竟然做这样的事儿。事实是什么样的呢？毛泽东晚年机要秘书张玉凤说，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，之后毛主席曾报过一次病危。1月底，毛主席对我们说，人家都回去过年了，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，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。张玉凤说她拿着两个鞭炮去放。高文谦是在造谣吗？他说并没有造谣，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，毛泽东是1月份说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。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，什么手段都有，‘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’。我看，中国人可能习惯了，只要是排成铅字的，就感到是真的，假定有很多人讲，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，不会是凭空来的。”

金冲及这里的意思是说另一位研究党史的人高文谦在造谣。金冲及的研究成果也是排成铅字的，是否就比高的铅字更可信呢？高文谦是否造谣，要看他叙述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手下人放鞭炮是否是事实？还要考证一下当时放的鞭炮只不过是“两个”还是很多？一个事实放在那里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。如果毛对周没有打压之举、没有对周病情的延误、没有批林批孔还要批周公的明确政治斗争指向，那么毛让手下人放两个鞭炮就仅仅是为了过年，别人不会多想。如果有那些明确的指向，你就不能不让别人对放鞭炮一事有自己的想法。即使是没有放鞭炮这件事，毛对周的感觉就“像春天一般温暖”吗？从周恩来逝世后毛对悼念周的群众加以镇压来看，他对这位老战友早已“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”了。这时候的周恩来，实际上已经成了文革开始前的刘少奇，只是周的生命先于他结束，而他本人也命在旦夕，无力在文化大革

命的基础上发动另一场清除异己的“大革命”了。

□ 原载《共识网》

~~~~~

【往事非烟】

一个“刽子手”的自白和忏悔

• 陈义名 •

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，我不知多少次想过、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。在有些人眼里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，就是忘不了，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。我却想讲出来。

我认为文学有两种。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，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；另一种，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、忧患一样沉重，支撑它的，除了笔杆之外，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。

◇ 被活体取肾的钟海源

1978年4月的一天，不知怎的，天还冷得厉害。那天中午，我正睡午觉，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，叫醒我，快起来，营部来电话，要交给你一个枪毙犯人的任务。

下午，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。房间里有黄副营长和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士小游。我和小游1977年年初同期入伍，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，俩人的关系挺不错，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，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，我们才分手的。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，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，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。

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，便命令道：你们都坐下，给我好好听着。

他也正欲坐下，见门未关，便去先关紧了门，那样子颇为神秘。

咱们九四医院住了一个XX场站的的飞行员，他父亲是XX军区的原副司令，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。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，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，九四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，准备搞移植手术。这种手术难度很大，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，便算成功了，在国内，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。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记录，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。肾从何来，甭说，你们也该知道，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，据医学上讲，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，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，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。还得找个年轻女犯……

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，目光轮番在我和小游的脸上扫了一会，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。显然，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，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。

九四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，正应了一句古话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你们连看守的省第一监狱里就有一个。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，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。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，要验明尸体，要拍照，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；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，取肾一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。要兼顾两方面，做起来挺麻烦的。

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，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，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。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，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，时间是明天，由谁开枪，临时再定，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。不过，不管到是谁开枪，绝对不能打左胸，左胸部位是心脏，一打当即就毙命了，千万得记住！”

晚上，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，我们三个，副指导员，五班的全班战士，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，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。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：“今天开这个会，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。”

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情况。

“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。也许你们听说过了，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！文革中，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司令，‘三结合’时进了地区革委会，当了个副主任，是一个典型的帮派头头。

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，一时间，她当年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，为她鸣冤叫屈，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，又贴去北京不说，竟还想劫狱，但真要谁来牵头，没有人敢牵，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，她叫钟海源，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。李九莲当司令时，她又是秘书，以后分到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。就是这面黑旗子一挥，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想劫第二监狱，李九莲被我们秘密转移了。他们的阴谋落空了，一回头又冲击了地区公安局，妄图抄走李九莲。

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，省委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，钟海源咎由自取，银铛入狱。竟又有一伙人想劫走她，因此在入狱的当晚，她秘密押来了我们一监。刑期是六年，应该是宽大的了。到现在，这六年也快满了，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。又臭又硬。打着红旗反红旗，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作为名，写下了几本反对笔记，否定文化大革命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，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。尤其是有一篇文章，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：‘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。’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，人民大众开心之日，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。华主席办事，毛主席放心，全党放心，全国人民开心。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鸣。可以说，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，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。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！”

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，“来。大家看看吧，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。”

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，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，人们唯恐避之不及，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，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，战士们正襟危坐，没有谁去动它们。唯有我不合时宜，抽了其中一迭来看。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。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，不是划满红杠杠、蓝杠杠，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，乍看上去，恍如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。笔记本也匆匆翻了几页，好几处见到张春桥，姚文元的名，不是为他们张目，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，被点到的就有《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》。我注意看了看时间，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……

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，“她不是反极左吗？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？”不过片刻，它又潜没了下去，“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，深奥，要不怎么叫政治犯呢？”

这天晚上，从不失眠的我，失眠了……

首先是因为兴奋。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，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。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，这次任务交下来，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。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，枪毙一个犯人给一个三等功。武警部队接手时，上了刑场，一人一

个嘉奖，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，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，而若有资格派上刑场，这嘉奖扳机一扣，就来了，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……

其次，也因为紧张。在部队里，凡是有上刑场经历的，身上都好像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，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？新兵们总爱问他们：“你们怕不怕？”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，眉飞色舞：“我怕个鸟？端起枪来，嘎崩生脆一枪。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。下了刑场，法院一摆压惊酒，十到十二个大菜，我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可痛快了……”新兵们常常匪舌不已：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。可敬佩归敬佩，真要轮上了自己，心里又难免不发怵、发虚一阵。老兵们在炫耀之时，也未少告诫新兵：开枪一定要快，要准，一定要一枪结果。若犯人欲断气未断气之时，看了你一眼，你的模样便象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。犯人家属来收尸，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，若要报仇，也许是十天，也许是十年，你在明处，他在暗处，那就麻烦了……

当兵就讲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，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，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。我不由得翻来复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，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疏忽，自然，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，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，说实话，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……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连队包围了第一监狱。五班分站两列，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，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。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，一进去，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，我悄悄问他：“那死囚怎么样？”

他在我耳边嘀咕道：“那个女的不得了！向她宣读死判决书时，要她签字，她未加思索就签了，然后把笔一甩，扭头就走。法院的人喝住她，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待，她回答：‘跟你们讲话费劲，我们的信仰不同’。昂头就走了。在监狱这么多年，我还设 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……”

我们去了关押钟海源的死囚小号。没有窗，全封闭，又狭又矮，颇似一个小闷罐。地下是一床草席，一卷被子。钟海源穿一件上面印有“劳改”两字的黑囚衣，坐在草席上，正吃她最后的早餐：四个小馒头，一碗粥，一碟小菜。象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，她吃得很有耐心。喝口粥，掰片馒头，再咬一小口咸菜。也没有谁催她。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，皮肤白皙，如画的柳叶眉下，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，象是两颗马奶子葡萄，即使在这生与死得临界处，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……

她全部吃完了，便站起来，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，抻了抻两袖和后襟，又拿出一把梳子，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，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辫，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髻。那安详的神情，颇象一位居家的少妇，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，将要提篮上街采买……

我突然想起了江姐。在电影里，歌剧里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，干干净净吗？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，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，那么现在更象是扔进去一堆毛，心里堵得厉害。目睹并参予对美的毁灭，总是残酷的，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。我只有拼命调动起“无产阶级义愤”来，我这样分析她，她肯定是在做戏，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。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，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，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，会凭白无故吗？！

又象是我在做戏，突然，一股热力窜上来，我牙齿咬得“咯噔”一声，五指也攥得紧紧的，

我在心里喊道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我是军人，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，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！

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。我和小游赶紧出来，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。一看，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，戴副大口罩的军人，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。

军医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。这针，是进口的，昨晚从上海空运来。为了保肾，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，可这种针剂特别痛，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，不能让她乱喊，更不能让她挣扎。”

我跳下车厢，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，他半卷双袖，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。我不禁问道：“副营长，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？”“我！”他这干脆利落一声，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。既象是卸下了什么重负，又象是压上了什么遗憾，既松松的，又痒痒的……

不一会，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，她五花大绑，双手反剪，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“现行反革命钟海源”的大牌子。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，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，待钟海源押到车边。我们弯下腰，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，提了上来。这一提，心都提虚了，原以为得用大力气，可提在手里，几乎象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……

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，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，双手绑住了，可头乱撞，脚乱踢，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。为了制服狂乱，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，我与小游，一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，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，然后各人的两手，一手抓肩，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，她却纹丝不动。因为距离太近了，这时，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，有些透明，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，都能看见……

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，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，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。囚车开动了，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，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，后面也是一辆卡车。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。车队向左拐，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，这是座女犯监狱，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，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，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，以极为复杂的神态，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，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、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。

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，出厂门，又向新建县城驶去。起初，仍象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，车子开得很慢，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，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：“这个女的真年轻，究竟犯了什么罪呀？要枪毙她……”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，脸上红光扑扑，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，似乎这囚车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。

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，车队的速度加快了，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，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。再出县城，尾随的群众都给甩了，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，一旦失去了观众，揪头发的也不揪了，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、聊天……这时，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，我明白了，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。我碰了碰小游，要他靠边点，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。

我回过头来，大吃了一惊！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，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，而是金属的，又长又粗，象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，甭说真打，就是看上一眼，我也猛一冷颤……

那军人过来了，掀起钟海源的衣襟，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。又要我让了让，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，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，他的动作异常利落，利落得让人感到

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，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的松柴……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，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，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，猝然之中，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，既象是什么在撕扯，又象是什么在挤裂。可她嘴里，三针下来，没有一针吱声……

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。三面环山，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，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，临路口处，有一口池塘，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。另一辆带篷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，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，后面的篷帘也打下了。旁边，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，可里面均未着军装。

囚车停住了，我和小游先跳下车，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。按原定计划，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，可后面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，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，这一拖延，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。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，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，没有谁敢喧哗。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，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。他们衣着破旧，颜色沉闷。而后，视线又越过他们，投向远处碧茵茵秧苗的无际平畴。眼睛越来越明亮，眼神也愈加空灵，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，细风之中，有一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，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……

最终，红唇皓齿，在她的脸上挑起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。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一只还在扑棱踢腾的白鸽，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，一下就红了眼圈，转身踉跄地走开……

突然，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，肤色一下转成蜡黄，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。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，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。

后面的车终于来了，下车后，由副指导员带队，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，跑几步，停一个兵。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：

“刑场警戒完毕，请指示。”

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：“我们警戒完了，下面是……”

王科长大手一挥，声若撞锣：“把犯人押过去！”

我和小游，推着钟海源就走，未走两步，她的身子便往下坠，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，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，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。按动作要领，朝她的膝盖，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，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，我们没有踢，想将她放下去，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。结果放了三四下，每放一下，她都是朝前趴着。我急了，抬头看了看小游，他脸上铁青，豆瓣大的汗珠吧哒、吧哒地往下滚，那手也哆嗦得厉害，显然是吓坏了。我真想骂他一句，没个鸟用。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行了！可刑场上有纪律，行刑人员不能说话，要表达什么，只能靠眼神、手势，我空出一只手来，用力向小游一推。他往后退了几步，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，琢磨了一下，先跨一步左腿，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。又俯下身，用右手从她的腋下插进去，以手掌抬起她的胸，我左手压住她的后脑勺，慢慢地放下去，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……

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眼色，他满脸焦灼的神情，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，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。我一松手，刚抽身，一阵风掣，他就窜了上来，枪口一下抵住钟海源的右背处。“砰”的一响，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一下，可没等尘埃落定，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淹没了，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，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枪口提得高高的。他一边嘴里骂道：“操你娘的×”，一边拉开枪机，黄锃锃的子弹一发、一发地跳了出来……

扑上来的是三、四个军医。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，就往车蓬里送。此时，蓬帘开了，我一眼看去，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，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，边上已经有医生、护士了。虽人影幢幢，却紊而不乱，动作迅捷，配合默契，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。乍看上去，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，可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，破坏了这份美好，它是U形的，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，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。我，小游和黄副营长，就站在车厢后，黄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，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，小游则战战兢兢，惊恐与迷茫，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，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……

黄副营长发现了，对小游喝道：“你还有脸穿军装？你给我滚，滚到那边上去！”血水愈加密集了，不但溢满了车底板，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。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，透过口罩，含含糊糊地讲了一句：“快点，快点，人死了……”

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，一位五、六十岁的老军医，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，揩几下，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棉里。约盛了半桶，他跳下车，拎起它走到池塘边，将血水倒进了塘里，不一会儿，整口塘全染红了，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，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跳出水面，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，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……’

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，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，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，此刻，他几个箭步冲过来，手指几乎戳在老军医的脸上，“你们是真不懂，还是假不懂，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，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？”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，这才象明白了过来，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，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，唯唯诺诺……

车蓬里的“手术”终于完了。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。说实话，在这之前，虽有时心里犯嘀咕，或是一阵紧张，但还未感到害怕。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來，我害怕了，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！

尸体丢在地上，刚好是脸朝天，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，一股热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咙里冲。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，转过了头，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，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，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，隔三岔五到战士中走走，不是捶捶谁的肩膀，抱抱谁的腰，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，让当事人哭不是，笑不得，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……

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“过火玩笑”。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，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，打出来便是开花弹。可执行枪决任务时，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。也许，他有打开花弹的瘾，平常捞不着机会，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，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么办呢？

公安，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，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。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。小游的魂，顿时附到我的身上，腿哆嗦得厉害，不是在走步，而是在拖步，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，又蹭去尸体边，我不敢看，更不敢搬弄那脑袋，便闭上眼，象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，将牌子上的铁线，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，抖抖地套了几次，终于套上了，又往自己这边一拉，牌子一放，便算是完成了任务。镁光灯噼里啪啦地闪了一通，正面，侧面，全景，特写……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，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

她的肾取走了，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，她被利用得很彻底，很干净，既用于移植肾手术，又给了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，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

里，供大夫，学员们作解剖标本。

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，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。回连队途中，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，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，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。我告诉她，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。她片刻无语，我又问了她一遍，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，一声长叹：“父母死了，丈夫离婚了，家里没有人了……”

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。也许是多喝了几两，回到营部，那话象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。有几个干部听了，过了些日子来问我：黄副营长说，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，他看得一清二楚，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……

“扯蛋！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，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，我什么都没能看到，他能看到？！”

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，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，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……

不过，他总归是位好人。我在刑场上的表现，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，看看可以，但要认真起来，是经不住摔的。而小游，则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从刑场回到连队，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，发高烧，吐胡话，象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……但黄副营长并没说三道四。若他有挂纲上线的嗜好，不久后，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，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。

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，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。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闲聊时，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，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，我们也都不提及此事。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。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，何况直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，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，这枪就不是吃素的，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，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。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，杀人，强奸犯，抢劫，投毒……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。毙掉一个，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，多一份安宁，少一丛棘藜，多了一掬绿荫。而我们参与枪毙的是两个政治犯，她的全部罪行，与其说在王科长给我们看的那一迭材料里，不如说就在她们的脑袋里。

那时，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，可随着历史的前进，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渐清醒过来，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，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，我的心里是发虚的，抑或说充斥了后怕。为了心灵能够平衡，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，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潮流，而不愿她这个案子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，能够获得平反。

一年，二年，三年过去了。除了当年的五、六月间，福州军区的《前进报》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“XX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：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”的消息，对我来说，我曾参予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，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……

1981年夏天，我回家探亲。一天中午吃饭时，父亲象是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放下筷子，神色郑重地问我：“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，姓钟的，最近平反了，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？”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一下愣住了。作为儿子，我了解父亲，他即使不说，我也知道他对此类事情的态度。他人虽正统，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——正统得麻木。他身

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，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。

此时，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，审视中，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。

“没有……听说，我们连里……没有……枪毙过女犯。”

我的喉咙里象被什么哽住了，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。又拿起筷子，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，立即埋头扒起饭来。可胃里又是一阵抽搐，手为之一悸，筷子掉在地上，也许脸色也难看。母亲忙问我：

“你那里不舒服？”

“没什么，喉咙哽住了……”

饭后，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。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，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。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，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书。我拿在手里，看了一遍，又一遍。这一张薄纸，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，将原以为枯萎，凋落了的，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、全部视觉、全部嗅觉、全部感觉，一下给狼狈残籍地扒拉了出来。

最后的早餐，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。江姐。白得透明的肌肤。纸箱般轻飘的躯体。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。体内象撕扯什么，又象挤裂什么的异响。小游铁青色的脸，豆瓣大的汗珠。黄副营长，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，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。一片翻动的白大褂。鲜亮的红雨幕。拖把、塑料桶。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。过火玩笑。开花子弹。套环游戏。镁光灯。压惊酒。阴毛。福尔马林溶液。剖开缝上、缝上又剖开的标本……

它们旋转着我，挤压着我。

它们俯视着我，追逐着我。

我大汗淋漓，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，

我昏天黑地，站起来，一脚高，一脚低。

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：“这女的，跟你……是熟人？”“不，她死在我们监狱……”。

这天夜里，我又通宵失眠了。

我想钟海源，一个死得多么冤屈的女性呵，若她晚判半年，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，她就不会被枪决了。我真不明白，放她半年，她既不会去杀人，也不会去放火，何必要急着搬她的脑袋呢？宣统皇帝，还有那么一大批国民党战犯，可谓恶贯满盈了，一放不也放了十年、二十年？就是要配合政治形势，你就不会稍稍念及芝麻、绿豆般大的慎重，给她判个死刑，缓期执行吗？

（作者姓名为化名）

~~~~~

## 【救赎之路】

一个昔日武斗杀人红卫兵的自责

• 彭 淑 • 张嘉衍 •

“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往这个伤口上洒盐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想完整记录往事”

“我关注药家鑫案。哼哼，我就在网上闹，此人不死，天理不容！”

“中国前40年，狠斗私批修，甚至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’。改革开放后，人的拜金主义又越来越厉害。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，从极其没有自我走向极端自我，不变的仍是人性的坍塌。”

北京苏家坨镇，稻香湖马场方圆百亩，星垂苍茫，万籁俱寂。王冀豫马靴紧缚，话语掷地有声。

一个杀人犯在讨论另一个杀人犯。二者的时间跨度，恰如这天——2011年5月16日距离发起文化大革命已过45周年。

◇ “文革”武斗，我打死过人

“喂，我是黑子。请问找我什么事？”2008年的一天，王冀豫接到了自己插队时的伙伴、《工人日报》老记者吴琰的电话。

吴琰向他转达民间学者王克明（他俩共同的朋友）的请求。王克明正组织一系列稿件，预备出书。而这批稿件的作者，必须亲历“文革”，以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，对那段岁月有所反思。

“我们持有一种理念，拒绝遗忘。”事后，吴琰谈起。

一如既往，王冀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更痛快的是，他在电话那厢坦言：“‘文革’武斗中，我打死过人。”

“我心想，我算找对人了。”尽管，吴琰听后大为震惊。那次组稿，她极少遇到如此率性的作者，“对于在‘文革’中的作为，有些人会刻意掩饰，还有些人想彻底忘记。”

未几，她便收到了王冀豫写的《背负杀人的自责》——

我是“大院”长大的孩子。所谓“大院”，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。……

1967年8月5日，中午。那天，天空混沌。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（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，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）同学常某某急匆匆到我家：“粮校（即北京粮食学校）的‘四·三派’阶级报复，昨天把我们学校‘老兵’高三的唐某某在路上绑架了，学校军代表斡旋，今天中午才放。在里面他被殴打、侮辱。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。现在正召集各大院‘老兵’找他们算账。”

我积极响应，并招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，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，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。……

大约一个小时候后，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张某某对我说：“真是阶级报复。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，因为有育英的‘四·三派’同学，李红星没当回事。抓进粮校后，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，在楼梯上用刀刺他。……”

我气愤极了，大喊“跟他们拼！”不顾高中生劝阻，二十几个“疯家伙”砸了校体育器材库，

工具库，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打人的东西翻出来，人手一件，冲出校门。……我们都“混蛋”了，一场恶战开打。……

我们到了粮校附近，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，都在试探。……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，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。对方的柳条帽、工作服、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“傻了”。

……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“好学生”，给他们做个样子，捡起一块鹅卵石，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，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：“打呀！”抡起来对车上的“四·三派”同学乱砸。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，乱石如雨，甚至砸到我背上。

……我拄棍呆了一下，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，就用左手护了一下，手腕剧痛，倒把我刺激正常了。

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，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，胜败即成定局。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：“打死他们！”事后，据别的同学说，我跳得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。

……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。他好像不敏感，跑得挺稳健。在路的东侧，我在他毫无反应的情况下，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。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，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，又动作迟缓地爬起。身体呈爬行状态时，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，血溅到棍子上。

当时，我疯狂兴奋地大吼：“你跑不了了！”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。……看着满地的抛弃物：田径标枪，长柄斧头，各种棍棒、柳条帽，我竟对天狂笑，像头野兽。

“乐极生悲”，此时“我方”同学陈某某从后面跑来，说：“咱们打死了一个，就是你打倒的那个。”

我惊呆了，怎么能打死他！还要拿他换人呢！

那一年，王冀豫16岁，北京翠微中学的学生。

#### ◇ 踏上救赎之路

“我打他的那根棍子，棍头呈四方形，上面还有钉。”

“当校医告知，他没救了。我一把揪住医生的衣领问，他真的没救了？！”

“他平躺在那里，颈部仍在喷血泡，双眼微睁，面色惨白，只有出气，没有进气。样子惨极了。”

“我犹如五雷轰顶，浑身发抖。从心里想往外喊——我不是故意的！事实却永远不能改变——我杀人了。”

如今，60岁的王冀豫，军人般稳坐，面无表情地诉说。

10岁时，王冀豫才意识到“人是会死亡”，他第一次“害怕极了”。

大人们淡定告诫他，是的，人确实会死。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》里说，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，……要为解放全人类的壮丽事业献身。

稍大，他和他的伙伴同志学会了穿皮鞋猛踹“阶级敌人”，因为“对待同志要像春风般温暖，对待敌人要像寒冬般无情”。

搞武斗，他是王朔笔下的“动物凶猛”，要如“林彪说，枪一响，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”。

“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被我狠狠打死了，他不该死的，我真的非常非常内疚。”王冀豫袒露。

素日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他，开始惶惶不可终日。

“那种滋味难受极了”——“我想到抗美援朝。我想多杀美国鬼子，以洗清自己的罪孽，兴许能重新变成好人。”当然，这也是为圆他儿时的“英雄梦”。

1967年9月18日，王冀豫踏上南下的列车，他要去海南岛当兵。

从保定起，他一路闻到武斗的硝烟。在某招待所附近的海军医院，他数过二十多具尸体，“全被流弹打死。有头被打碎，进城的老农。也有胸口中弹，卖甘蔗的小女孩。还有一个干部，子弹从左脑穿过右脑。”

这时，他想到了王彦宏，“非左即右”的大脑陷入思索，“咱们这个社会到底在干嘛？凭什么这些无辜的人们要枉死街头？”

在海南岛，他待了两个多月，曾经阻止了一场武斗。

“一派头目要拿刀扎另一派抢枪的人。我冲上前去，一把攥住他的手腕，夺下那把刀。那人其实很浑，可我杀过人，我知道他这么干，一定会后悔。”王冀豫每每想起那幕，都称自己特别勇敢。

奔赴前线的请求未被批复，北京又不断传来消息——警方正在追查凶手。

于是，他给家人写信，他杀了人，要投案自首。一生教导他要“做个正经人”的父母，对此没有异议。

同年12月14日，正当他与朋友们离别饯行，有人通知他，他父亲的战友来了，想在外见面见他。

他一溜小跑到门口，只见数名军人伫立，“我们奉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，向你宣布拘留。”

“你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吗？”一人问。

“我是一个杀人犯。”他相当平静。双手铐上的时候，蓦地释然。

◇ 在河南农村，价值观被颠覆

1968年年初，王冀豫被押送回北京半步桥监狱。

“我早想到了死刑，我非常服。”他肯定道，那次蹲监狱于他，“关键及时，恰如以后人生的每一步。”



他像一个文盲，掉进了一所“大学”里。

以前为了塑造成“忠诚的革命主义事业接班人”，骨子里尚武的他也在读书，“但要好看才行，比如《八十天环球旅行》、莫泊桑、杰克·伦敦，《红楼梦》我可看不进去。”

监狱里多是政治犯。他们劝他，好好看看吧，那可是一本大百科全书。他们为他讲解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、《九三年》，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……

“在这样一个‘淡泊以明志，宁静而致远’的环境，这样一群人对我的轰击就是要读书，动脑子，像他们一样善于表达。”他说。

1968年9月27日，王冀豫转入中央学习班。那里聚集的更是政治犯中的“精英人物”。他直喻自己升入“EMBA”，或者“党校”。

1969年春节前夕，王冀豫从学习班放出。

在家，父母告诉他，他能活着，要感激王彦宏的父母。那对朴实善良的老人，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，考虑到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，原谅了他。

1975年，王冀豫执意回到农村，抱着“投奔延安革命圣地”的心境，来到河南驻马店的“最穷的县”——新蔡。

那里有邓英淘（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之子，现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）、吴琰（中宣部教育处处长吴寄寒之女）、金观涛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）。

“回头一想，我生命中结缘的人，多是思想境界高于他人。”

在生产队当队长的邓英淘率先接纳了他。不久，邓发现他是一个“难办”的主儿。

“我能不发飙么？就拿城市的经济现况说吧，粮票、油票、鸡蛋票、布票、买火柴，样样都要本。芝麻酱一年才二两，香油在过年有，总共也才二两。农村生活只会更惨。除了物质生活供给困难，还有文化的流失。一切的一切，你要一个要求下乡、立志改造与再造中国的人怎么想？”王冀豫摊开手地求问。

“我们现在要的不是牢骚，而是怎么办？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一一《怎么办》。”同样为国家前途忧虑，在争论中，邓英淘对他深刻地指出。

那时，吴琰跑来找王冀豫，“黑子，你上我们徐营去吧。我们小队更苦。”

“行！哪儿苦上哪儿。”他二话不说，扛起背包就走。

麦收的一天，一个村民热情招呼，老王，晚上你过来喝酒。今天队里有人降生，从此又是144口人了。

这也没多大事呀？他不明就里。

“有。我们队在人民公社成立时是144口人。可到1959年，就饿死了73口人。直到今天，我们才恢复到最初的人数，”村民解释道。

“乡亲们‘忆苦思甜’。忆的不是1949年，却是1959年。我们说错了吧，你们应该谈旧社会。可他们说没错，1959年，家家没有不死人的。”吴琰记忆犹新。

王冀豫方知，包括他住宿的羊信家，在那个年月，一家饿死了8口人，只剩羊信一人。

“羊信结婚后，生了两闺女。还是饿，我把自己每月的粮票给了他，饿谁也不能饿孩子。”他颇心酸。困难时期，他们一帮大院子弟正享受保育院与在小学寄宿教育制，“除了馋，真没挨过饿”。

日后，他和吴琰常聊，我一个无法无天的人，确实被徐营事实给震住了。

那次，是他俩过去灌注而成的价值观被颠覆的起点。

◇ 我不信忏悔，只信仰真话

1979年，王冀豫返城，进入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到深圳经商；1989年，在京承包下稻香湖马场，牧马至今。

老友王克明悉数王冀豫后来的人生之路。他以为，他与王冀豫，以及编进书中的大批作者心路也相仿：

“我们这代人生长在毛时代，从小接受教育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父辈辛苦打下的红色江山要由我们继承。这份责任感在‘文革’一系列变故中，产生嬗变，从而建立自己的独立思想。”

他们从“家国”意识扭转“国家”意识。从“崇敬个人，相信前面有很多敌人，相信阶级斗争理论，将暴力视为英雄行为，一切围绕革命价值观行动”到清醒认知，“那个年代导致恶的现象，恶的行为”、“只要一个群体只接受一个人思想的时候，那个群体必然什么思想都没有了”。

“我不认同‘忏悔’这个词，忏悔有用么？”王冀豫反问。

1969年，他被放出后，从未见过王彦宏的父母亲，“警方不让我们相见，怕再生闹派系间的矛盾。恐怕他们现已不在人世。”这个硬汉声音低沉。

当年武斗的很多情节，如烟消逝，“但有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，就是“仇恨”！”一如他在文中描述，“好像我们的体能、智能都超水平发挥。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，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。”

这篇《背负杀人的自责》发表后，在美留学的女儿读到，很是郁闷地对他说，原来你过去那么坏啊？

“我怎么跟她说明这些？她受西方教育浸染，她能理解‘文革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从‘文革’之初，从我打死王彦宏的一刹那，不得不承认，我灵魂的异化就开始了。伴

随其间，有金观涛、邓英淘等人不断地对我塑造。点点滴滴的积累，直至徐营时，它发生了突变。这个异化让我接受普世价值，认识到什么才是民主、自由、理性。”

“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里有一句话，我们从小到现在被各种谎言灌满了，当他成熟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要呕吐。我是生生吞咽进去。每个人在猛醒一瞬，哦，我上当了，我受骗了，它是一个伤口。每个人的伤口，形成了历史的伤口。可为什么会有？为什么不但今天有，上下五千年历史上也有？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往这个伤口上洒盐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想完整记录往事。”

“当人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，有什么比真实更值得追求？我有信仰，我信仰真实的力量。就像我在农村和老百姓待在一起，我感到我是真实的。就像我的马，它们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不喜欢让你骑，偏不让你骑。它恣意使性，不会暗中害人，不会虚伪地说，我是伤害了你，但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已到凌晨1点，这位马场主站起，他要去马棚巡视去了。

2008年冬至，他为己逝的奶奶和父亲，还有王彦宏烧纸。

轮到烧给王彦宏时，火就是点不着。他急道，不用你原谅，我欠你的！恨我，也别和自己过不去。

火腾地燃起。

（部分文字引用《背负杀人的自责》）

□ 原载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11-06-06

~~~~~

【口述历史】

我所知道的红卫兵——卜大华口述（下）

• 采写：卜伟华·徐绥之·编辑：卜伟华·米鹤都•

（续 z k 1 1 0 7 d）

◇ 锒铛入狱

联动12月26号大会后很兴奋，第二天，我对我们班的几个参加了大会的人说，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再受任何人的控制了，再下面，我们就等着看吧！好戏会层出不穷的。那时候，骆小海因为肝炎住院了，有几个人去看他，就把当时这种非常激烈的情绪传播给他。他一怒之下，就写了一篇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。

这个东西拿回来以后，就被我扣住了。我说，这个东西不能写，不能拿出来，拿出来是授人以柄。说说还可以，但不要用文字的东西。不管是谁，把这个东西拿出去，只能一个结果，就是被抓起来。所以我把它扣住了。但是王力、戚本禹来了以后，邝桃生再也忍不住了，慷慨赴死啊！他自己决定把它抄出去，他用“延征”的名义把《致中央文革》贴出去了。

《致中央文革》指名道姓地批判江青，批判中央文革。它一出来，就像一颗重磅炸弹，迅速传播，造成很大影响。那时候的形势，非常的沉重。造反派在学校里写了很多大标语：“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延征！”邝桃生只能隐姓埋名，再也不能在任何场合出现了。

在这之后，北京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“砸联动”事件。

第一拨砸的是京工附中，造反派骗他们红卫兵，说要到学校开大会，让他们必须到会，结果到会以后，由公安局配合，把他们几个人扭在大卡车上进行游街。

砸石油附中那次，石油附中的红卫兵在地下室里，造反派就往地下室里灌水，把那帮人弄得浑身都冻僵了。

那时候，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非常迟钝，不知道自己也已经很危险了。因为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没有做什么应该受到镇压或惩罚的事情。

1月25日早晨，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了。他们来了上百人，有清华大学“井冈山”的，有我们学校“井冈山”的，101中的，可能还有京工附中的。他们点名要抓我，明显是寡不敌众，他们在宿舍楼里打呀、砸呀，闹了好长时间。我也幼稚，其实当时要跑也就跑了。但是，那时候我觉得，我自己有义务去和他们讲清楚“联动”是怎么回事，我以为可以讲清楚。我自信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。你们不就是要抓我吗？我跟你们去！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
当晚，他们把我送到了公安部。我原来不相信公安部会收我，结果公安部是照单收人，说这个单子上有你的名字。他们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，我拒绝签字。然后来了一辆车，把我送到半步桥监狱去了，还给我戴上了手铐。到半步桥后，让我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，还问：你有什么要求？我说，我要求立刻把我释放！要求中央领导立刻接见我！他们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意见替你反映。

结果第二天、第三天都没人理你，我在里面大声地喊叫，也没用。当时，除了按“联动”名单抓的一百多人外，4月5号还抓了一大批人，都关在炮局（11）。半步桥这边也就几十个人。我旁边的屋子里关着农大附中的郝晓平，还有矿院附中的苏振生。我们这两个房间中原来有一个小洞，后来掏成了一个挺大的洞。我们每天可以在这里谈话、聊天。正好他们那几个学校的情况我原来都不太知道，这样我们就有很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聊天。就把过去学校的情况，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意见以及怎么到团中央闹的等等，都讲了。

我在里面被关了88天，那时候真没有一点害怕。第一是没有觉得有罪，第二我觉得还有机会。预审科一共问了我三次，但没有一次问关于我犯了什么罪的事儿。比如问我，你们学校都收到了些什么反动信件了？还问我，你们“联动”有一次在长城开会怎么回事？我说我没参加过任何一次这样的会。我参加的会就是12月26号的会和1月10号的会。我就是反对你们随便抓人，你们确实是随便抓人，我就是被你们随便抓来的。他们还问了很多无关痛痒的事儿。我说，这些问题你们不应该把我放在这儿来问呀！他们说，是呀，说句老实话，你们的事儿，我们也管不了。

“二月逆流”的时候，开始感到紧张了。原来外面的事情都不知道，中间有一次把北航的苏小前和孙茜玲拉出去斗争。回来以后，听说有“二月逆流”这么回事，几个老师、几个副总理闹起来了，结果，全社会现在都在批判他们，叫“二月逆流”。

我在里面的消息来源是这样的。一是通过李井泉的儿子、清华大学的李黎风，他不知因为

什么被关进来了。这个人非常好打交道，监狱里让他给被关押在里面的人理发，因此，我们都可以通过和他聊天了解到很多事情。二是通过放风，监狱是一个五角形的楼，有一个挺大的空间，都到这里放风。在去放风的路上，可以看见许多人。三是我们这两间屋子因为有个谈话的通道，三四个人可以聊天，所以不算很寂寞。

2月份的时候，听说抄到一个绝密文件，是“联动”的宣言，直接攻击毛泽东的。社会上批判“联动”都以这个为根据。我们认为那肯定是假的，后来出来看到这个东西，所谓003号文件。这个东西，虽然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，但是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。

事后想一想，“联动”到底是个什么组织？在那样一种状态下，其实社会上上下下多有不满，很多人对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都感到愤怒，但只有“联动”这样一个组织，公开地发出了这么一个信号，也引起了更多的人思索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十二月黑风”。“二月逆流”时，很重要的一条，也是为“联动”鸣冤，说“十几岁的孩子，怎么能是反革命呢？”目标不光是他们，主要还是想要抓他们背后的人。

我们在里面的伙食很差，生活之所以不好，是因为政法学院的“政法公社”造反派接管了公安局，他们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管理监狱。吃得很差，主要是些烂白菜，有时候加几个完全没有肉的丸子，一顿两个窝头，上午下午完全一样。到春节的时候有些变化，那时候军管了，吃的菜里面有时候能见到肉了，一礼拜有这么一两次。在里边洗过一次澡。洗澡是一次大串连，在一个大池子里洗，见了不少人。问了一下大家都是什么情况，有没有审问，审些什么东西。

◇ 释放联动

4月22号那天，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，晚上都已经躺下了。突然开始点名叫人，出来站在操场上，一看一大片人，也不知道什么事，以为要拉出去斗争呢。那太好了，拉出去斗才好呢！在里面最希望发生的事儿就把我拉出去斗，我看你们能斗出个什么名堂来！军管会的人讲话，以前都叫“被拘留人员”，那天一开始就称呼“同志们”。他说，今天晚上，中央首长要接见你们，在人大大会堂，马上就坐车去。于是，我们乘坐三辆大轿车，前面还有警车开道。那天，警察都点头哈腰的，态度变好了。

到人大大会堂，好像是从南门进的，南门进去右边第一个厅，好像是安徽厅。门口有一大堆人。到里面坐了一会儿，就看见中央领导人鱼贯而入，总理、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戚本禹、王力等。

江青最先讲话。她说，我刚才都吃了安眠药了，但是我还是要来。我不知道谁是彭小蒙，彭小蒙最近给主席写了信，说要救他们的同学牛皖平，牛皖平来了吗？牛皖平站起来了。啊，你就是牛皖平啊，好，你坐前面来。主席看了信就说让我们来见见你们。她讲完了，总理讲。

总理一上来就说，委曲大家了。接着把放人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。他说，这个事情是我最先发现的，我到广州去，他们告诉我，这里也抓了好多“联动”分子，我一问才知道，他们抓人了。我说，不能这样嘛，不能不教而诛嘛！回到北京，我就把这件事向主席汇报了，主席说，不要抓嘛，应该把他们放出去。给他们办公室，给他们车子。

总理还专门问，有清华附中的吗？我就站起来了。没想到那边又站起来一个人，原来是熊刚，我不知道他也被抓进来了。总理点了好几个名，两个女孩，一个蓝小兵，一个骆小锋，又点了一个董良翻。那天，总理始终没有笑容。他讲话的时候，下面哭成一片了。我也哭了。当

时我就有话说，我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过去，但是那天哭得没法讲话。我写了一个条儿，说，希望总理有时间再接见我们一次。总理念了这个条子，而且说，我们准备找一个时间，把你们和你们的家长都请来，我们再谈一次。

然后是陈伯达讲话，他说，打、砸、抢的砸字，我过去都不认识，不能搞打砸抢嘛！他嘟嘟囔囔讲了一通。康生讲了什么呢？他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嘛！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还是祖国的宝贝，祖国的财富，特别是如果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。有些人到八宝山，去搞什么祭奠死人，去哭坟，这不好，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。

然后征求我们的意见说，主席叫放，我们的意见也是马上就放，你们还需要回去拿东西吗？是不是明天早上再回去？很多人大声喊道：现在就回家！什么东西都不要了。后来听说有人还是回去拿了一点东西。我是再也没回去。

那天我没回家，晚上没公共汽车了。我跟着李元到邝桃生家去了。邝桃生没有被抓，但遑遑不可终日，一直提心吊胆。“联动”这事儿不完，他的事儿也完不了。我们到他家后，他妈妈马上给我们炖了一只鸡。第二天，我回了家，很快就又回学校了。因为我想见大家。这件事完了，大家总算都可以放心了。

我被放出来以后，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约了我一次。我为什么见他呢，就是听说他和彭德怀谈过话后，幡然醒悟。他支持“联动”了，反中央文革了，所以我也愿意见他。他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两件事儿，一是他参加过很多中央文革的会议，对中央文革的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，与我和王任重那种关系完全不同。他对其他几个大学的红卫兵领袖，对“天派”，对北大，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那意思是他只要有所动作，就能把他们平了。二是他认为中央文革这些人是在利用学生。朱成昭说，你们反中央文革实在是精神可嘉。他和中央文革打交道多了，慢慢觉得中央文革是在利用他，利用学生，利用造反派，打击“联动”。而他也不甘心完全被人利用，所以很快就出现他反中央文革的事儿。

在和朱成昭谈完话以后，我就觉得我们和大学生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大学生是在非常自觉地参加政治活动，而我们那时候则是非常自发的活动。我们参加运动，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，而大学生就不一样了。

◇ “大联合”

我被抓起来以后，原红卫兵的一部分人成立了一个小组织，叫“红卫兵革命委员会”，简称“红革会”，说是要和我们划清界限。其实，这也是一部分人在寻求一种生存的方式。没办法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你被抓起来，你干了些什么事儿，别人未必都知道。他们可能觉得，如果都背着这个包袱，大家都永世不得抬头。那么，只有把你们抛弃，我们重来。对这种事儿，我觉得很理解。

“红革会”的头儿是张明。他对我说，你回来了，还是你来管事儿吧。我说，还是你管事儿吧，我还得休息几天。这时有人给我送来一份材料，是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，其中讲到触蛰说赵太后的故事。实际上这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？你们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对你们是真爱护的。我们正是爱护你们，所以对你们更严格。

因为4月22号那天总理说，准备再接见我们一次，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在地等着接见的消息。结果等了一个礼拜，也没消息。然后，我们就去云南了，转了有一个多月，是旅游性质。回来再重新审视，文革的事情还没有完。那时候中学的造反派已经开始分“四三派”、“四四派”

了。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拉起很多人的队伍了，但我们要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梳理。

这年“五一”的时候，戚本禹在天安门上还专门问了一下我们学校的程金香，卜大华他们放出去以后你们怎么样了？程金香说，我们“井冈山兵团”分裂了。戚本禹说，我们原来以为把他们放出去，你们能更团结，没想到你们倒分裂了。

到了1967年12月份，我才有了一次被接见的会，说是总理要接见。我说，总理接见，那我得去。我到卫戍区报到，然后去了人大会堂。到那里一看，是戚本禹和谢富治两人主持的一个会，我一下就泄了气了。那次会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。戚本禹说，今天找大家来，讨论一件事儿。主席最近提出，是不是将共青团和红卫兵合并？听听你们的意见。然后挨个儿介绍参加会议的人，谢富治是谁也不认识，戚本禹还都认识。我发言时，戚本禹介绍，他是老红卫兵。我说，我不是老红卫兵，我就是红卫兵。我同意红卫兵和共青团合并，因为红卫兵谁都可以成立。

1967年底前后，北京各中学差不多都已经“大联合”了，只有我们学校还没有联合。我们学校当时主要有三派，有“井冈山兵团”、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和红卫兵。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和我们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，我们在关于“大联合”的谈判中提出三派在革委会中人员比例为6：4：4。“井冈山”不干，认为“思想兵”和红卫兵加起来人太多了，他们提出6：4：3，红卫兵减少一个人。我们想，我们两家加起来有7个人还是多数，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吧。其实我们对这个革委会的兴趣并不太大，在面对面的情况下，我们从来都比他们表现得更自信。

最后就按6：4：3达成了关于联合的协议。我们出三个人，出谁？出两个高中一年级的和我。红卫兵的意见，不要说出三个人，我们就是只出一个人也要出卜大华。“井冈山”提出，你们出谁也不能出卜大华，他要当了革委会委员，就等于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提议换一个人，但是大家都不同意。我又提出，在“井冈山”的群众没有谅解之前，我可以不去。就是说，我这个名额可以空着。最后我说服大家，同意把我“挂着”。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我们学校来，祝贺“大联合”。他说，清华附中终于实现了“大联合”，在这个“大联合”的过程中，红卫兵，特别是卜大华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他讲完话以后，还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见我，说，你做得很对，就是因为你这样做，“大联合”才能成功。当时外面围满了人，有些“井冈山”的人喊：他是反中央文革的！他昨天还讲反对戚本禹的话。李钟奇是一概不听，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因为如果不是我说服红卫兵，那就不用联合了，可能一直就那么拖下去了。所以李钟奇毫不吝惜地把他的溢美赞扬之词都给了红卫兵。他讲完以后，引起“井冈山”非常大的愤怒，当天晚上，教学楼门厅里贴满了大字报，说卜大华怎么反戚本禹。仅过了几天，就传出了戚本禹垮台的消息。有的红卫兵就在他们那些大字报上批上“打倒戚本禹！”“打倒戚驴！”这时候才知道，为什么李钟奇当时丝毫不理睬他们讲的那些反戚本禹的事情。李钟奇是卫戍区的，他肯定早就知道戚本禹被抓起来的事了。

◇ 经历武斗

从把“联动”打成反动组织以后，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就已经结束了。后面所有的事儿，不过是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“反革命”而做的努力。

在这个时候，偶然发现了我们学校“井冈山”的头儿——刘刚写的两篇大字报的底稿，一篇是批周恩来的，一篇是批康生的。估计是她准备写大字报，后来因为形势变了就没有写成。

你们不是天天都在骂我们反中央文革，骂我们是反革命嘛？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反革命？我们找到军训团，军训团看了后说，这个东西挺恶毒的。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还派人到北京市公安局、北京卫戍区、北京市革委会，都去问过，这个东西怎么办？人家不管，都说我们向上面反映，但都没有结果。我们就干脆给她发了个通缉令，就是要搞臭她的名声。把她的大字报底稿上的内容抄在上面，说她恶毒攻击总理，攻击康生，就是反革命。我们把通缉令在北京市内一些繁华地段张贴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正在宿舍里睡觉，被军训团叫到办公室去。我一到那儿，很多人坐在那里等着开会呢。北京市卫戍区军训指挥部一个负责人，拿起电话说，现在召开电话会议。他说，现在发现社会上有这么一个通缉令，里面登了两篇东西，用非常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央首长。这个东西看见以后都要立刻销毁。他向北京市所有的军训团通报了一遍。通知完了，他对我说，这个东西谁写的？我说，是我们写的。他说，你要把怎么写这个东西的前前后后经过都写出来。中央首长现在还没有睡觉，等着听汇报呢。我当天夜里就写了报告，说明发现这个东西后，先后向军训团、北京市公安局、北京卫戍区、北京市革委会都反映过，他们都说这个东西很恶毒，但是都没有说要采取什么行动，在这情况下我们就写了这个通缉令。你们要把这个报告送江青，那就送吧。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

1968年的“五·二九”，我们听说，给主席写信，他不一定能收到，但是如果发电报，他肯定能够看到，因为电报是必须要送到的。我们就到电报大楼发了一个电报，就是想让他注意到，他曾经写过信的那个红卫兵组织，它还活着。我们还到中南海西门，给毛主席送了一个红卫兵袖章，用镜框装着。完事后，我们就回学校去了。后面的几个人，在路上突然碰到刘刚了。这几个人一下子就把刘刚围住了。其实，我们原来发通缉令，主要想造成一种精神上的压制，结果还真抓住她了。他们找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回来，还多了一个心眼，这是申克美干的事儿。他想：把她抓到学校去也不是好办法，我们没地方关她呀，还有对军训团也不好交代。那时候，清华大学的两派，“井冈山”和“四一四”正在武斗。刘刚不是和蒯大富的关系很好吗，他们直接就把刘刚送到蒯大富的对立面“四一四”那儿去了。

我一听说这件事，气坏了。我们跟清华大学想撇清还撇不清呢，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嘛，你们把她送到那儿，不是给人口实吗？当天晚上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应对这件事情，“井冈山”的人就突然就向我们进攻了，手里拿着长矛等武器。武斗爆发了，“井冈山”占了教学楼，我们占了宿舍楼。那时候军训团还在，不断地在两边进行调停。

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。但是如果没有清华大学“井冈山”的话，他们不一定打得过我们。食堂在靠近教学楼的地方，我们几次去打饭，他们都从教学楼上向我们扔石头，所以我们处境很不利。

而且第二天，清华大学又发生大规模武斗，打死了人，武斗全面升级，从那以后就开枪了。眼看着就要波及到我们这儿了，我们再呆在学校肯定没什么好下场。于是我们就撤走了。

说起武斗，我们学校在这之前还有个“三·二三”武斗。

1968年3月22日，“井冈山”的人贴出了许多骂红卫兵的大字报，还在红卫兵办公室的门上用墨涂满了标语。我们非常气愤，准备向他们讨一个说法。第二天中午，在食堂门口，我们把干这事的仲维光截住了。仲维光是我们班的，他在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。截住他以后，就让他为我们擦门去。说话间他们那边一个高一的学生先动了手，结果就打成了一团。

那次，他们那几个人全挨打了。最后，军训团出来了，问怎么回事。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

遍。结果，他们因为理亏，只好吃了一次哑巴亏。这是文化革命期间，我唯一的一次，在能够预测到打人的后果而没有加以制止的事。这件事超过了我们忍耐的限度。但在那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准备对我们进行报复，还从清华弄来了很多长矛。所以刘刚被我们抓了之后，他们已经箭在弦上了。

我们撤出之后大约有一个月，一天，我被“井冈山”绑架了。被抓的那几天，我每天都蒙着眼睛，关在清华哪个楼我都不知道。到底是谁打我，审问我，也不清楚。后来军训团组织两边进行谈判，几经周折达成协议，7月3号，双方同时放人，“四一四”也放了刘刚。之后，我就到外地转了一圈。

◇ 沉重的包袱

1968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了。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，有五个上山下乡了。

我去的是延安地区。延安这个地方，在我们眼里还是圣地。因为红卫兵去延安的人比较多，我也算是带队的。一个军宣队的，一个工宣队的，还有一个是我。我们三个带队的，那一批带了好几百人。

到延安以后，我跟那两个带队的商量了一下，把原来的安排打乱了。我说，下乡是一件长远的事情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跟上学的时候不一样。下乡是大家要在一块儿共同生活，所以除了男女平衡以外，最重要的是大家自愿结合，于是就重新进行了组合。后来我们去的人都还比较团结，干得都不错，和这次按自愿原则组合重新分配有很大关系。工宣队也比较满意，认为处理得很好。

我是在延川县关庄公社齐家坪大队插队。我们村的知青相当不错。我们这批人所在的几个村儿，在后来评先进的时候都被评为先进集体。北京青年一来一大片，每个村子都有，哪个村儿的知识青年怎么样，老乡也都在口传，对我们那几个村的知识青年的评价相当高。

不久，农村搞整党，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党员，但我们都成为了整党领导小组的成员，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帮农民办。我们还帮他们办学习班，帮他们学文化。我们在农村还办了一个油印的刊物，《红卫兵通讯》。

到了农村以后，我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上的包袱放不下来，“联动”这个问题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在农村整党时，第一批就要发展我入党，结果报上去以后，没批。没批的原因无非是“联动”问题，有些事情讲不清楚。老乡跟我都很好，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，问我，你在学校把谁得罪了？

后来通过父亲的老战友，我到部队当了兵。在连队也是干得不错，搞了一个连队图书馆，办了一个夜校。连队很多战士的文化程度挺低的，我编了一套课本。其中选用了毛泽东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中关于中华民族的一节，一边讲地理、一边讲文化，学习识字。我还写了个小话剧，并参加演出。我的表现应该还是比较突出的。这个部队文革初期时在越南修路，不知道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，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就应该提干部，结果到学校去调查，学校讲了我一大堆东西。那个时候正在反“五一六”，结果还把我当成了“五一六”的嫌疑，不要说提干，入党也入不了。

我在部队呆了两年就复员了。但到哪里，这个东西你都躲不掉，只要江青他们没倒台，就会一直存在着，都还会在你的档案里放着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公安部于1979年正式

为我开具了关于联动问题的平反证明，这个事情才算有了个结果。

注释：

1 1．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。

（全文完）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本期编辑： | 《华夏文摘》执行编辑： | 《CND》总编： |
| 华新民（美国） | 思语（美国） | 陈天寒（美国） |

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－8 6 0 2

投稿专用地址：tougao@cnd.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：cnd-cm@cnd.org

如需有关《CND》和《华夏文摘》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，获取

中文文件：hxwz-info@cnd.org 英文文件：cnd-info@cnd.org

《华夏文摘》万维网服务站（WWW）地址：<http://www.cnd.org/>
